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23.05.00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 民族走廊研究的新分析框架

张继焦 张 爽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民族工作与民族学研究的主线。以往的民族走廊研究基本是从区域内部的视角展开,注重对民族走廊内部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与现实经验及其理论生长进行纵向研究,忽略了其所处的中华民族话语叙事的宏观社会背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现实与实践的三个维度为民族走廊研究提供了宏观层面的分析框架。从历史维度看,民族走廊研究要关注中国古代边疆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现实与实践路径维度看,要关注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以及各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科技进步等的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将有助于推进中国民族学派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民族走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3)05-001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研究项目“历史经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20VMZ001)、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2019ZDGH01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和所重点创新工程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背景下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改革与完善研究”(2022MZSCX006)。

作者简介:张继焦(1966-),男,汉族,海南海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二级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张爽(1992-),男,满族,河北承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

2021年8月举行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之后,2022年7月举行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进一步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扩大到统一战线各组成部分的共同体意识建设上,这意味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再局限于民族事务层面,

而是在各民主党派、民族事务、新社会阶层、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阶层、海内外侨胞、宗教事务等各个层面均需筑牢。^[2]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3]在当前铸牢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背景下,对于民族学来说,就是要将民族学理论与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结合起来,帮助解决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民族的相关研究,一般是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入手,结合历史文献与经验研究进行的。从调查方法来说,1950年开始的民族识别和1956年开始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基本上是以民族为单位进行的,即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其所使用的“民族”概念是以斯大林的四要素定义为基准的。由于在现实调查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很深,一些研究者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更大的民族区域,即一个省一个省地进行。^[4]到了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后,民族区域的走廊研究视角成为民族学界关注的新领域。^[5]1988年,费孝通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6]的新民族理论,成为此后几十年民族学界讨论的焦点之一,客观上使得民族走廊研究大有沦为边缘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可以说,国内民族研究经历了从各个民族单独调查、民族区域调查,到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再到铸牢“一体性”的共同体意识的阶段性发展历程。

梳理民族研究领域的焦点转型过程,可以发现,围绕着民族走廊区域进行的民族研究已经生发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民族区域内“交往交流交融”经验,以及增进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等研究方向,成为民族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之一。在新时代强调“共同体意识”的宏观背景下,民族走廊的理论与研究经验面临着新研究框架与研究视野的期待。本文通过分析以往民族走廊的相关研究议题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维度,初步探索新时代背景下民族走廊研究的新分析框架。

一、民族走廊概念的形成与研究议题

“走廊”是费孝通在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集合了历史内涵与地理特征的分析概念。他在1978年9月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提出了“藏彝走廊”的说法,^[7]而后又在多次民族调查与会议讲话中逐步形成了“民族走廊”的观点。1982年12月,他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谈道,“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

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4]他认为,“对这些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研究者能够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从而能对中华民族的内部多样性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8]随后,李绍明系统地阐述了“民族走廊”的确切内涵,并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明确的学术定义,即“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5]李绍明认为,“民族走廊”从一个建筑学概念到地理学概念,再到民族学概念,必然要将自然地理与人类共同体结合起来思考。民族走廊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沉淀,对它的研究,不仅对于民族学、民族史上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而且也有助于该民族当前的现实发展。^[5]

李星星结合费孝通、李绍明两位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民族走廊”是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于古代冲积平原农业文明区域边缘的、属于一定历史民族或族群选择的、多半能够避开文明中心政治经略与开发、既便于迁徙流动又便于躲避以求自我保存的、其地形复杂而又依山川自然走向平面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9]近年来,又有学者通过分析费孝通关于“民族走廊”概念的历次讲话,梳理了其深层次的内涵与特征,最后总结出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民族走廊的空间过渡、意义多维、文化多样与和谐交融。^[10]总之,以上关于“民族走廊”的定义从概念层面勾画了总体研究范畴,为各民族走廊的具体研究提供了基础纲领。

从研究范围来看,围绕着民族走廊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藏彝走廊、西北(河西)走廊、南岭走廊、辽西走廊等大型民族走廊。近年来,一些研究也提出了古苗疆走廊^[11]、武陵走廊^[12]、河湟走廊^[13]、东北亚走廊^[14]等概念,但这些研究尚未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界较为普遍认可与讨论的民族历史区域。究其原因,它们或是从属于较大民族走廊内部的小型走廊,比如河湟走廊应归属于西北民族走廊^[15];或是多考察了历史上曾存在的民族迁徙孔道,比如

古苗疆走廊属于明清时期的民族沟通驿道^[16]；或是缺乏明显的“通道”地理特征，比如东北亚走廊范围过于宽泛，缺乏地形上的完整“廊道”或“河谷”特征；或是与四大走廊相比，区域范围较小、民族交融较弱、形成时间较短等。

从研究议题来看，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1) 民族走廊的概念与范畴。在“走廊”概念提出的早期，学界对民族走廊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藏彝走廊”，并围绕着费孝通对此划定的范围进行讨论。同时，一些研究者也有不同的边界争议，并提出了“汉藏走廊”“横断山民族走廊”“藏羌彝走廊”等提法，但大多数学者仍以“藏彝走廊”称呼之。^[10]类似的争议概念还有河西走廊与西北走廊、西北民族走廊以及南岭走廊等。(2) 走廊内部的村落与通道。民族走廊的区域性特征使其具有较为宽阔的空间属性，在这样的空间中，历史上修筑的道路、人口迁徙驻留形成的村落，成为走廊研究的重要内容。周大鸣指出，村落、道路、走廊与族群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也成为人类学从传统的村落研究迈向区域研究的努力方向和突破口。^[17](3) 族群互动与民族关系。“走廊”概念提出的一个关键出发点就是从走廊的民族关系中，理解中华民族的整体及民族间的互动结构，因此，许多学者从族群或民族关系出发讨论走廊区域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18]此外，在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民族走廊还期待着结合微型社区研究与民族区域研究，借此探讨中国语境下民族的分合关系。^[19](4) 民族宗教信仰研究。由于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一些研究者对走廊区域内的宗教信仰及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给予了重点关注，试图从中发现不同宗教信仰和谐共存、交流融合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20](5) 民族语言研究。走廊区域内十分复杂的语言现象，是语言学与历史学研究的宝藏。^[21]从这些互相杂糅的语言现象中，可以增强对语言系属的认定与语言科学规律的探索。(6) 区域社会发展。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文化遗产等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民族走廊区域内的社会发展成为新的讨论点。^[22]这些与现实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研究议题，往往注重探索与分析民族文化元素中的系统性保护与资源化开发的整合路

径，以帮助实现其现实的行政目标。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议题基本围绕着民族走廊内部的实质性内容条分缕析、自下而上地呈现了走廊区域内的文化整合动力与民族互动模式。其研究立足点是区域内部视角，注重对民族走廊内部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与现实经验，及其理论生长进行纵向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忽视了地方或区域内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叙事的现实需求。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三个维度

对各民族在实践维度中凝聚而成的共同体意识的强调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这一问题所对应的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与现实中，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结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这一结构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影响。问题是理论产生的源泉，理论是指导实践的纲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能够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以及民族事务整体治理的现代化建设。

回顾以往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民族学界大概围绕着三个维度进行研究：

一是历史维度，即指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实体、民族自觉到中华民族自信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不同部落人相互往来、流动与征伐，逐渐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自在的部落联盟，随后又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华夏的人类共同体。这个在相互交流中形成的华夏共同体，继续向四周扩展，并与不同的部落群体相互征战与交流。各个不同部落群体在地理上以中原为中心相互来往、彼此学习与渗透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整体格局。由此，现实交往逐渐演变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央-四方”“天圆地方”“中心-五服”等思想，此后又发展出系统的“天下”宇宙图式。在这样的观念下，古代中国以王朝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在分裂与统一的更替中，通过政治-文化机制塑造了“大一统”的思维模式，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在基础。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兴起，西方

民族-国家理念进入中华大地,冲击着两千多年的王朝政体,使得中华大地的当政者清王朝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情境下,梁启超总结出了“中华民族”^[23]这一概念。之后,吴文藻提出,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与政治之别。^[24]面对国内日益严重的危机,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25]的提法,而费孝通又以中华民族的内部多元性予以回应。1943年,蒋介石以宗族论论述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26]这一系列的论辩均说明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正在觉醒。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中华民族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上奋起直追,同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逐渐形成。改革开放之后,基于新的国情,党和政府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政治话语有意识地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出后,费孝通又提出了“和而不同、文化自觉”的观点。由此,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元民族融合为一体的共同体的自觉意识得以增强,强有力地巩固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宪法表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表述;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018年的新修宪法首次将“中华民族”的概念表述纳入其中;2021年8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这些关于“中华民族”的表述充分体现了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自觉的民族共同体,再到自信的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转型,也是在历史观念上实现了从“天下”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呈现了国家塑造公民身份认同的核心符号的过程。由此可知,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稳步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必定还会在新的情势下产生新的发展变化。

二是现实维度,即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工作指导下,推进各民族社会主义现代化协同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推进、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3]这些要求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思想指导。因此,现实维度始终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主要包括推动民族地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等方面。在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方面,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同时,要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27]这一内容指明了要推动各民族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指明了民族地区共同走向现代化、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任务与实现路径。具体来说,首先在发展理念上,要坚持“差别化原则下的区域支持政策,推动民族地区既有层次又有深度的全面改革开放,提炼自身发展的内在潜能”^[1]。特别是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发布后,推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要紧跟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的相关要求,充分照顾到“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状况,推动民族地区在发展阶段、理念与格局上将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结合起来”。^[1]其次,在经济建设上,要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水平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定点对接、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支持帮扶政策,将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节奏联结起来。同时,加大对民族地区建设的公共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上的整体扶持。而且要统筹规划经济、社会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努力满足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心理期待,即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的提升。第三,在农业发展上,立足民族地区的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实际,将国家“三农”政策与民族地区发展结合起来,支持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促进民族地区的基层组织、农牧业和农牧民的治理水平、产业质量、生活环境、风土习俗和经济水平的总体发展。同时,在沿边的民族地区,要完善边境开发开放政策,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

在加强国家现代化整体治理方面,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坚持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具体来说,首先要改进和健全民族事务工作的领导与治理体系,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

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1]的多元治理格局。新格局要求将党、政府与社会这三方主体协调起来,共同参与民族工作的治理中,并“切实将民族工作从‘一域’(局部)或‘单一’工作部门之事转变为全党、全国和全社会共同参与与行动之事”^[28]。同时,在治理模式上,有学者指出,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已经呈现出党政领导下的“复合性治理”的路径,突出强调了政府领导与社会参与的协作性与全域性。^[29]这一复合性的治理路径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现实经验支撑。其次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水平。民族事务工作要始终在认真贯彻宪法精神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下进行,坚持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思维,遵循依法治理的实践路径,健全民族事务的法律体系,积极稳妥地处理民族工作领域的各项事务。第三是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培养能够妥善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干部队伍,特别是要加强对工作在条件艰苦的基层地区的干部们的关心、理解与培养。

三是实践路径维度。具体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定“民族区域自治”不动摇,确保制度建设在国家推进民族工作可持续、现代化发展方面的基础举措和重要保障地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革命时期的民族理论应新中国全面建设发展的新需求、适应国家民族实情的中国化结果,它以民族平等团结和谐互助作为新时代民族关系的基础,必须要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与不断完善。二是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潜能直接关系到增进全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因此,要推动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点的深度融合,促进民族地区内生性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三是强化对五个方面的文化认同,即“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014年9月党中央提出,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讲道,“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各民族要相互学习、相互欣赏”^[30]。此后,总书记又说,“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

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31]这些讲话均在表明,践行铸牢民族一体意识的主线“必须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关键,加强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32]。因此,要鼓励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民族共有精神转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听得懂、看得见的展演形式。四是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的互嵌式社会结构^[33]。世界上任何一个稳定社会的形成都是在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演化而成的,因此也都是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的,中国社会无异于此。王朝时期的中国社会秉持着开放与包容的心态,促成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传播,维系了统一多民族社会的整体样态。自古至今,社会中不同民族间的互嵌使不同民族成员掺杂或嵌入到其他社会结构中去,创造了各民族接触与交往的机会,为实现民族交融提供了现实条件。^[34]同时,互嵌也不意味着消除民族特性,而是在多元之中达成新的动态一体。这种动态性的各民族之间、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互动为共同体及其意识的巩固提供了支撑。

以上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形成的历史、现实与实践的三个维度为民族走廊研究提供了宏观层面的理论框架,弥补了单一民族维度和互动民族关系维度在面临政治-文化叙事时的短板与缺失。这一现状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35]中也可以得到解释。以往的民族走廊研究注重对其内部的自生结构进行分析,而忽略了其所处的外在结构,即宏观经济社会背景。由此,对外在结构影响下生成的民族走廊研究的生成结构与结构转型缺乏敏感。这一理论框架提醒我们,在进行民族走廊研究时要注意到自身、外在与生成性结构之间的联系。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走廊研究的新分析框架

2022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会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36]也就是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的研

究,离不开对现实生成性因素的具体化、微观化研究,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高屋建瓴,又要扎根基层。

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结合以往研究,民族走廊的相关研究应主要围绕着增进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展开。从历史维度中,可以总结出以下与民族走廊研究的相关议题,即中国古代边疆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华文化与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等。而在现实维度与实践路径之下,基本围绕着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以及各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科技进步等的关系来展开。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不同民族走廊研究领域内的关键人物的研究观点和学术成果进行整理与汇总,从中可以发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民族走廊研究的一些知识生产格局与总体特征。

表 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四个民族走廊研究内容的部分呈现

	藏彝走廊	河西走廊	南岭走廊	辽西走廊
历史上,边疆与中央的关系	费孝通 ^[4] 、王明珂 ^[37] 、王铭铭 ^[38] 等	张雄 ^[39] 、李如东 ^[40] 等	赵世瑜、陈春声、方铁 ^[41] (注释 ^①)等	李大龙 ^[42] 、崔向东等
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	费孝通、李绍明 ^[5] 、石硕 ^[43] 等	张力仁 ^[18] 、秦永章 ^[44] 、袁同凯、徐燕 ^[13] 、李建宗 ^[45] 等	袁丽红 ^[46] 、朱其现、杨育智 ^[47] 等	崔向东 ^[48] 、吴凤霞 ^[49] 等
历史上,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	费孝通 ^[50] 、王明珂 ^[51] 、石硕 ^[52] 、王铭铭等	陈庆英、赵桐华 ^[53] 、冯国昌 ^[54] 等	覃德清 ^[55] 、周大鸣 ^[56] 、何海狮 ^[57] 等	崔向东 ^[58] 、吴凤霞 ^[59] 等
历史上,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	王铭铭 ^[60] 、徐新建 ^[61] 、李绍明 ^[62] 、赵旭东 ^[63] 等	马惠兰、刘源 ^[64] 、李元元、切排 ^[65] 等	麻国庆 ^[66] 、李星星 ^[67] 、周大鸣 ^[17] 等	崔向东、刘丹、秦红增 ^[68] 等
新时代,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袁晓文 ^[69] 、杨华军 ^[70] 、石硕 ^[71] 、孙宏开 ^[72] 、马尚林 ^[73] 等	宁军 ^[74] 、张鸣春、顾文兵 ^[75] 等	龙平生 ^[76] 、李军、袁丽红 ^[77] 等	郝文军、薛雷平 ^[78] 等
新时代,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	唐白晶 ^[79] 、邹立波 ^[80] 等	郑堆、王振宇 ^[81] 等	李晓明 ^[82] 、韦浩明 ^[83] 、梁军 ^[84] 等	穆崑臣 ^[85] 、郭永平 ^[86] 等
新时代,走廊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等的关系	罗良伟 ^[87] 、袁姝丽 ^[88] 、沈博、幸晓峰 ^[89] 等	王文棣 ^[90] 、傅才武、钟晟 ^[91] 、刘兴全、许艳丽 ^[92] 等	侯玉霞、冯智明 ^[93] 、文冬妮 ^[94] 等	于富业 ^[95] 、刘继祥 ^[96] 等

从表 1 中可知,民族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已经在各自的研究中部分地涉及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些内容,但从三个维度进行全面研究的学者和成果相对较少。在学科归属上,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研究主要是以民族学、历史学学科为主,而且相关研究人员多是该领域的学术权威;而现实发展方面的研究则呈现出学科多元的研究特点,在研究人员上也以中、青年学者为主。总之,以上历史、现实与实践路径三个维度构成了新时代背景下民族走廊研究的整体式分析框架,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有了更多层次性、实质性的研究内容。

由此,本文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民族走廊研究的新分析框架,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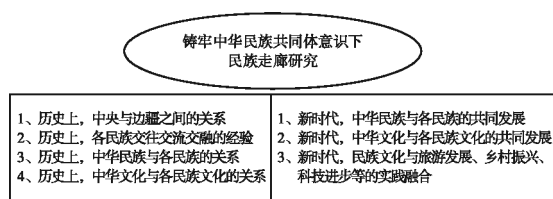


图 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走廊研究新分析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初步探讨的这个民族走廊分析框架是对当前中国国家与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的现状思考。它旨在从自上而下的、更加宏观的“国家-民族”视角来对民族走廊研究进行整体把握,并不意味着能够代替民族走廊内部分析的诸多议题。一些学者在对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于自上而下式的“伞式结构”与自下而上

式的“蜂窝式结构”的并存^[97],由此转移到民族研究中,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也就是说,民族走廊研究也要在宏观的“国家与民族”关系层面与微观的“民族走廊内部”层面共同着手,推动民族走廊的整体性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走廊研究成为了一种理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与国家-民族关系的手段。

四、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学界的研究思路经历了各民族内部边界划定到民族走廊区域内的多民族互动,再到强调共同体价值的铸牢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历程。其中,民族走廊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学领域适应国情发展而提出的分析民族区域现象的新研究视角。这一分析视角旨在从区域来理解整体中国,并通过中国领土内的各民族关系结构来抽象出中国式的民族关系理论、国家发展理论乃至国际关系理论。它突破了以往对单一民族进行内部分析的研究路径,重点关注走廊区域内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往来与文化融合。理论是对时代发展规律的总结,也是探索新发展方向的基础。回顾民族研究模式的现代转型,可以发现,这一历程是从微观层面的具体民族分析到中观层面的民族区域研究,再到宏观层面的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理论研究。因此,当前背景下的民族走廊研究,要注重将对民族走廊的内部分析转型到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历史、现实与理论研究中。其中,历史梳理与经验研究仍将是拓展民族走廊分析框架的主要途径。

此外,民族走廊研究也进一步反思了西方以一族一国为特征的民族-国家理念,及其带来的“国族主义”的深刻影响。民族走廊是中国式民族研究的创新理论,它将关注单一民族内部的研究取向转型到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的民族关系的研究视角,再上升到以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的国家-民族关系的研究取向,最后直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体研究视野。这一研究历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式国家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三个过程: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的关系。^[98]在新时代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中,增进共同体意识是新一轮国家-民族关系的塑造,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创新国家-民族理论的民族学

贡献。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思路,国家-民族关系更能够有效地解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与转型特征。而这一转型的关键在于将各民族交融的历史与现实经验转变为对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铸造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走廊研究需要新的分析框架的指引。相信在这样的框架指导下,将有助于推进中国民族学派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在2013年举办的“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南方边疆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中,赵世瑜以《明清帝国在南岭走廊:历史人类学如何着眼》、陈春声以《猺人、蛮人、山贼与土人》、方铁以《边疆史地研究的若干选题》为题分别论述了南方边疆的民族交融与社会发展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第1版),2021-08-29.
- [2] 习近平.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N].人民日报(第1版),2022-07-31.
-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第2版),2022-10-17.
- [4]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03):2-6.
- [5] 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A]//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10.
- [6]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4):1-18.
- [7]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01):147-162.
- [8] 费孝通.给“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A]//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1.
- [9] 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J].中华文化论坛,2005(03):124-130.
- [10] 王佳果,姚建盛.民族走廊研究四十

年:领域知识生产分析及反思展望[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5):222-232.

[11]杨志强,赵旭东,曹端波.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02):1-13.

[12]黄柏权.费孝通先生与武陵民族走廊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4):12-17.

[13]徐燕,袁同凯.河湟走廊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临夏州唐汪人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21(03):28-43.

[14]崔向东.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论纲[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5):2-12.

[15]李建宗.通道之间:西北民族走廊界隔中的连续——基于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之间的关联性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18(02):67-72.

[16]杨志强.“国家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地域与民族社会——以“古苗疆走廊”为中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2-9.

[17]周大鸣.走廊与聚落——潇贺古道石枳村民志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6):40-54.

[18]张力仁.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03):84-93.

[19]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M]//费孝通文集·第10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24.

[20]崔明.多元宗教生态系统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以西北民族走廊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3):32-36.

[21]刘辉强.“藏彝走廊”的民族语言[A]//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315-323.

[22]侯玉霞,代涵奕,张鲜艳.南岭走廊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J].广西民族研究,2020(04):158-166.

[2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四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4.

[24]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M].陈恕,王庆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99-419.

[25]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N].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02-13.

[26]蒋介石.中国之命运[M].上海:大公出版社,1945:1-6.

[27]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N].人民日报(第1版),2021-08-29.

[28]王延中.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民族研究,2022(01):1-13.

[29]马俊毅.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战略及其现代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1):72-80.

[30]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85-86.

[31]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N].人民日报(第3版),2021-03-07.

[32]刘吉昌,金炳镐.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1):28-33.

[33]高承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12):24-30.

[34]王希恩.民族的融合、交融及互嵌[J].学术界,2016(04):33-44.

[35]张继焦.换一个角度看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新古典“结构-功能论”[J].西北民族研究,2020(03):178-189.

[36]习近平.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N].人民日报(第1版),2022-03-06.

[37]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38]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9]张雄.唐太宗经营河西走廊略述——兼谈唐初关于内地与边疆关系的争论[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6):154-158.

[40]李如东.纳“旧疆”入现代: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发河西走廊诸论述中的边疆话语[J].云南社会科学,2021(03):53-59.

[41]赵娜.“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南方边疆

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04):79-81.

[42]李大龙.榷卯:走廊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3):46-52.

[43]石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A]//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13-1.

[44]秦永章.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67-72.

[45]李建宗.族群流动与社会平衡:20世纪上半叶马鬃山在河西走廊多民族分布格局中的意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08):8-15.

[46]袁丽红.平地瑶与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南岭走廊民族关系研究之一[J].广西民族研究,2018(04):156-164.

[47]朱其现,杨育智,向云.南岭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启示——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研究之一[J].贺州学院学报,2022(02):6-11.

[48]崔向东.辽西走廊变迁与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102-108.

[49]边昊,吴凤霞.论辽金对辽西走廊交通的经营[J].北方文物,2019(04):93-97.

[50]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91.

[51]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52]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J].民族研究,2014(01):78-89.

[53]陈庆英,赵桐华.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思考[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2(02):44-48.

[54]冯国昌.多维民族视域下的互动与抉择——民国时期祁连山北麓藏民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7(05):51-57.

[55]覃德清.关于开展南岭民族研究的构想[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64-69.

[56]周大鸣.民族走廊与族群互动[J].中山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6):153-160.

[57]何海狮.南岭与“多元一体”的瑶族——从费孝通的“瑶族共同体形成之问”出发[J].青海民族研究,2019(02):86-91.

[58]崔向东.论辽西走廊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5):16-20.

[59]吴凤霞.辽金时期的民族迁徙与辽西走廊滨海州县的发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109-114.

[60]王铭铭.初入“藏彝走廊”记[J].西北民族研究,2007(04):64-83.

[61]徐新建.“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由藏彝走廊引出的综述和评说[A]//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82-110.

[62]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华文化论坛,2005(04):5-8.

[63]赵旭东,单慧玲.中国走廊学发凡——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J].思想战线,2017(02):1-11.

[64]马惠兰,刘源.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文化特点和文化建设的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06):51-54.

[65]李元元,切排.关于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互动模式的分析——以阿克塞、肃北、天祝三县为例[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99-105.

[66]麻国庆.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定位及意义[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84-90.

[67]李星星.再论民族走廊:兼谈“巫山-武陵走廊”[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2):16-25.

[68]刘丹,秦红增.“一带一路”与中国民族走廊研究再认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05):31-36.

[69]袁晓文.和而不同:藏彝走廊多续族群与其他藏族支系关系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2):7-15.

[70]杨华军.藏彝走廊研究:统一国家意识的塑造[J].西藏研究,2016(03):52-59.

[71]石硕.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点与

启示[J].中华文化论坛,2018(10):4-8.

[72]孙宏开.再论西南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及其相关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6):29-39.

[73]马尚林.论藏彝走廊回、藏民族的和谐社会关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07):24-29.

[74]宁军.河西走廊多元民族文化交融方式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09):34-39.

[75]张鸣春、顾文兵.走廊地带和谐民族关系的精神引领、社会功能与构建路径——以河西走廊为例[J].前沿,2020(04):71-76.

[76]龙晔生.南岭走廊民族区域平等发展:概念提出及路径选择[J].民族论坛,2016(06):4-7.

[77]李军,袁丽红.南岭民族走廊际经济互动研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03):102-111.

[78]郝文军,薛雷平.基于民俗视角的辽西走廊地区多民族文化共生互化研究——以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为例[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6):82-86.

[79]唐白晶.藏彝走廊多民族圈舞及其中中华文化认同功能论析[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2(02):68-75.

[80]石硕,邹立波.藏彝走廊中藏文化的影响与辐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2):2-6.

[81]郑堆,王振宇.河西藏传佛教文化的包容性及其研究价值——以吐蕃和西夏时期为例[J].中国藏学,2022(03):151-156.

[82]李晓明.南岭走廊过山瑶传统文化基本特征探论[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01):121-126.

[83]韦浩明.多族群区域制度文化认同的建构——以南岭走廊中段为例[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01):77-81.

[84]梁军.新时代长征精神在南岭民族走廊的“嵌入式”传承[J].社会科学家,2021(10):40-45.

[85]穆崧臣.“同化”与“异化”:三燕时期辽西走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06):54-57.

[86]郭永平.地域景观、民族文化与辽西地区高质量发展[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22(02):161-167.

[87]罗良伟.藏彝走廊之城镇化发展模式探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3(01):144-146.

[88]袁姝丽.构建藏彝走廊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文化遗产廊道的可行性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21-25.

[89]沈博,幸晓峰.“藏彝走廊”民族音乐遗产及其保护研究[J].藏羌彝走廊研究,2018(02):104-109.

[90]王文棣.对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发展的战略思考[J].西北民族研究,2011(04):54-58.

[91]傅才武,钟晟.文化认同体验视角下的区域文化旅游主体建构研究——以河西走廊为例[J].武汉大学学报,2014(01):101-106.

[92]刘兴全,许艳丽.“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9(05):20-27.

[93]冯智明.南岭民族走廊传统村落的多维空间实践及其演化——以瑶族传统村落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10):36-41.

[94]文冬妮.南岭走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与廊道构建[J].社会科学家,2021(03):70-75.

[95]于富业.辽西走廊文化遗产保护研究[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6):16-21.

[96]刘继祥.辽西走廊旅游资源优势特征与发展对策思考[J].江苏商论,2010(08):134-136.

[97]张继焦.新结构主义:一种对“中国式发展”的新解释[J].中州学刊,2018(01):71-76.

[98]张继焦,尉建文,殷鹏,刘波.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J].广西民族研究,2015(03):1-12.

收稿日期:2023-03-05 责任编辑:王珏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Ethnic Corridors under the Forging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Zhang Jijiao, Zhang Shua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JOURNAL OF ETHNOLOGY, VOL.14, NO.5, 16-25, 2023 (CN51-1731/C, in Chinese)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23.5.002

Abstract: In the 1980s, after Fei Xiaotong put forward the concepts of a “Tibetan-Yi Corridor”, a “Northwest Corridor”, and “a Nanling Mountain Corridor”,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orridors in ethnic regions became a new focus of attention in ethnology.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have analyzed Fei Xiaotong’s previous speeches on the concept of “ethnic corridors”, tried to sort out its deep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finally inferred four aspects of the content, namely, the spatial transition of an ethnic corridor, as well as its multi-dimensional significanc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harmonious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research topics, relevant research conducted by scholars mainly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First, the concept and category of an ethnic corridor. Second, villages and passages inside a corridor. Third, ethnic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s. Fourth, the study of ethnic religious belief. Fifth, national language research and sixth,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These ethnic corridor studies have been basically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l region, focusing on the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history,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growth of minority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ethnic corridor, while ignoring the macro-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discourse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study additionally proposes that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the realistic dimension, and the practical path dimension of consolidating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t the macro level for the study of ethnic corridor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rst one, historical dimension, the study of ethnic corridors should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cient frontier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all eth-

nic grou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ll ethnic group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all ethnic cultures; under a realistic dimension and practice path dimension, further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opics such as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ll ethnic groups, a shar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ll ethnic cultures in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ethnic culture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is article, moreover, sets forth that the study of ethnic corridors in the current context should focus on transforming the internal analysis of ethnic contiguous stretches into historical, realistic,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with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s its core. Among them, sorting out the hist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ught to be the main way to expand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ethnic corridors. In addition, the study of ethnic corridors has also given a further reflection on the Western concept of nation-state, characterized by “one nation, one state”, as well as the profound impact of “nationalism”. An ethnic corridor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novative theory of Chinese-style ethnic research.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nation of the new era, consolidating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s both a new round of shaping state-nation relations and an ethnological contribution to innovating the state-nation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ing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holds the firm belief that this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will help to promo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thnology.

Key Words: ethnic corridor; consolidate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